

差異化的主體，行政化的管理： 評析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*

Differential Subjects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:
Book Review for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*

許雅斐*

書名：中文譯名「性主體的塑造：性、性別與權力的政治」〈原著書名：
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, and Power〉
編者：Parker, Richard, Barbosa, Regina Maria and Aggleton, Peter
出版年：2000
出版社：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
頁數：271 頁

此篇書評介紹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* 這本書，如何由邊緣性主體的位置，挑戰現代國家行政權的管制基礎。在說明愛滋預防措施如何建構／塑造「性」的社會意義時，他們闡明，愛滋論述如何被醫療化，並藉由行政管制措施，佈建身體的權力網絡，注入性道德所隱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，再由社會的規訓機制，運作出性的污名及受排除的「他者」。這些權力技術如何形成？如何生產出行政管理所需要的性主體？

特約論文。

*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助理教授，e-mail:yfhsu@mail.nhu.edu.tw。

[關鍵字]：治理、行政管理、性主體、愛滋、性工作

重要的是，我要靠這個工作生存。¹

(夏林清編，《日日春—九個公娼的生涯故事》：22)

長期以來，科層組織與文官體制，常被認為是民主國家行政管理的表徵。它既代表著國家權力的集中與分立，也說明個別部門有其法定地位、權責份際及從屬關係。個別公民則在行政體制的層層包裹中，實踐他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。「公共行政」因此被解釋為一套恆定的、長久的、連結公民身份與國家治理的機制。公法保證它的運作基礎，公權力則凸顯公民既受保護，也受管制的事實。然而，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對治安科學（*Polizeiwissenschaft*）的重新考察，卻說明現代國家的治理有賴特定的權力技術，也與某種政治理性相連結。在《性史》中，他指出，自十八世紀以來，醫療機構即與性治理的技術密切相關。不只性本身可能受性慾影響，而且，如果不加控制，性還可能傳播疾病，或給後代帶來新疾病—就這樣，性成了人類一切疾病之源。因此，必須透過醫察—也是政治的計畫，將婚姻、生育與壽命，納入現代國家的管轄領域。性及其繁衍必須受行政管制。（Foucault, 1990: 118）他認為，由於現代國家對總人口的治理，必須接合個人的生活與生命，因此，醫療不僅僅是性的社會安全機制，也在性規範中區隔出性價值的優劣，做為行政管理之道。同時，藉著將個人轉變為治理的主體，個人的總體化也延伸了國家的管轄權。

運用傅柯對政治理性與權力技術的分析，來自各國的多位作者分別在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 這本書中，透過「身體、文化與認同」、「性、性別與權力」及「霸權、壓迫與賦權」三個層面，分析當代性主體的多樣變貌與抗爭意識。在說明愛滋預防措施如何建構／塑造「性」的社會意義時，他們闡明性／性別／權力在二十世紀末期所歷經的轉變，以及性主體的社會想像，而這主要來自於各種行政措施及邊緣主體相互會合的效應。² 書中說

¹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二日，此篇論文寫作期間，報端刊載了台灣妓權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—官秀琴女士投海自盡的消息。重新解讀〈官姐的故事：我要有出頭的一天〉時，特別節錄了這句話。除了點出本篇文章的要義，也向她為台灣妓權運動的付出致敬。

² 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此書主要觀點皆環繞著性／身體的社會建構，但有部份作者卻認為，傅柯的權力分析有其限制，拒絕採用。而在此書後記部份，作者亦說明，雖然二十

明，愛滋論述如何被醫療化，並藉由行政管制措施，佈建身體的權力網絡，注入性道德所隱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，再由國家的規訓機制³，運作出性的污名及受排除的「他者」。透過性差異的揭露，他們質疑，做為直達身體／心理的管理技術，行政措施如何生產出性的社會／心理範疇？當愛滋預防將性／別研究延伸至邊緣群體時，一個重要的問題儼然成形：那些具政治抗爭意識的邊緣主體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其主體性？

這樣的觀點擴充了行政管理的理論面向與運作方式。行政管理不只是分層的、片段的、技術性的措施，而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理性做為支持。在探查治安科學的理性化原則時，傅柯說明，做為對人施加政治權力與理性干預的一種形式，治安的作用是為人們提供一點額外（extra）的生活；通過為人們提供一點額外的生活，為國家提供一點額外的力量，而這必須由「交往」—即個人的共同活動（工作、生產、交換、食宿）—的控制才能達成。這些權力技術以身體為目標，目的在於運用特定的、連續的、持久的方式對個體進行統治。如果說國家是一種集權的政治形式，那麼這種個體化的權力，即是傅柯所謂的「牧領」（pastorship）。⁴ 此書作者們運用這個觀念，論證針對青少年、性工作者及同性戀的愛滋預防措施，如何藉著性價值的差異化，深入社會肌理及個人內心，從而創造了不受歡迎的、有問題的、危險的性主體。

這無異是將公共行政拉回它所處的歷史／社會／政治脈絡中，重新提醒，它所施行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，他們的生存及生活。但各種行政管理的方式，卻常預設

世紀的最後二、三十年，傅柯的性部署（deployment of sexuality）引發西方工業國的大量文獻探討性的新典範，但是，愛滋的普遍流行，才是引起國際關注性科學論述的重要力量，參見 R. Parker, R. M. Barbosa, and P. Aggleton (2000). (eds.),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.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42-243.

³ 傅柯認為，現代社會的運作並非受制於單一的、大一統的政治體制，而是由家庭、學校、工廠、醫院等各式規訓機制，組成一個多重權力關係的網絡，關於規訓機制如何形成，詳見 Michel Foucault (1995). *Discipline & punish: the birth of the prison*. Alan Sheridan (trans.,) New York: Vintage Books。另外，規訓機制也常與規範相互運作，此觀點可參考許雅斐（2007）。性／規範與仇恨犯罪：性工作的政策管制。《文化研究》，第 4 期，頁 39-80。

⁴ 傳統上，左派政治經濟學常把權力關係設定為階級的、集體的，因此，個體化的權力可視為批判現代國家施政的一大突破，對於行政管理如何塑造現代個體，參見趙曉力、王宇潔譯（2002）。

了現代個人的主體性，並藉此達成管制的目的。書中多位作者都指出，「治安與危險，警察與犯罪」這些已設定的對立關係，其實是性價值在道德場域的鬥爭，而對立關係中邊緣主體的實踐，則有助於現代人的解放：「把我們從國家及與國家相關連的個人化形式解放出來。我們必須透過拒絕數世紀來強加於我們身上的個人性，創設出新型態的主體性。」（Butler, 1997: 101）。換句話說，各種規訓技術的運作，是為持續製造符合其管制目的的主體，也因此，那些被排除的邊緣者，便成為政治抗爭的重要支點，以改變現代個體的性成分。對此書作者而言，性的邊緣主體肯定性，肯定自我，肯定自己生存之道的論述，具備了顛覆權力運作的潛能，因此得以驅動超越歷史霸權及文化枷鎖的主體再造，進而發展出社會改革的方向與力量。

因此，做為一個特定的知識場域，公共行政不只是社會秩序的安排與維護，透過在地情境的重繪，知識論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認知。在由下而上的研究視野中，這些性的邊緣主體—男同志、性工作者、青少年—展示了身體 / 情慾 / 性意義的多重樣貌，特別是在愛滋防治與性工作的討論中，此書作者們不但切入主體重構，也在探討行政管制的理性化原則時，反思性 / 別規範中性價值的不平等—正因為行政措施中特定的性價值框設了個人，性差異才得以成為必要的政治理性。由於性本身承載了社會開放、文化前衛與政治反抗的意義（甯應斌，2007），邊緣性主體的浮現，反而使現代國家行政權的管制基礎，變得是可以質疑的。因此，這本書的作者們反問，構成現代生活的性、身體與慾望如此多樣，行政體系如何能標舉單一規範，要求大眾奉行不渝？

一、行政管理與性治理

針對這本書，至少有兩篇英文書評，都注意到了性如何形塑行政管理措施。在第一篇書評⁵中，蘇珊·格林哈爾（Susan Greenhalgh）指出，此書作者們所關切的性主體，既是知識論中的主體，也是為了社會與性的改變而有意識地抗爭的主體行動者（subject-agent）。更確切地說，這些被研究者並非因為不符合主流的性道德，而被問題化的「他者」，相反地，作者們都融入被研究者所處的社會情境，肯

⁵ 引自 Susan Greenhalgh, (2001). Book Review on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. *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*, 27(2) (Jun., 2001): 386-387。

定他們的主體能動性，並將他們的社會實踐與論述抗爭轉化為新知識觀點的來源及力量。由於深刻意識到，各種行政措施所隱含的性價值如何侷限了主體，所以作者們聚焦於性文化及其社會情境，強調有必要「重新制訂」行政介入的概念。既然此種介入是在集體再現的層次運作，作者們認為，一個較有幫助的方式，是聚焦於以社區為基礎的，根植於文化的教育與預防措施，以改變那些只鼓勵「安全性行為」的集體規範與價值。這樣的觀點將「行政」重新置入社會情境，並將它視為公共價值的創造及轉化障地，性差異因此觸發了權力的抗爭點。

在另一篇書評⁶中，凱琳爾·馬龍尼（Kareen Malone）則說明，愛滋預防與性別議題（關於女性、再生產等）常在當前的國際會議中被討論、被挑戰，並且形成聯合國政策倡議的基礎；不難想像，性主體的創新研究與理論是當前的迫切需要。在此書中，「性的主體性」是該書的核心議題，是政治／社會情境與特定意義的理解，而性慾望的生產與性行為的發生皆以此為基礎。借用來自傅柯、女性主義、酷兒理論、文化研究等不同領域的理論創新，作者們指出，性的生成有其公共文化與社會界線，在性與公共領域之間，可穿透的界線是公共衛生的長期論述，而性的疾病化則是藉著「他者」的形塑，如妓女或同性戀，還特別偏好那些外來者。公共行政因此指涉的是一套不平等的性主體，並將其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基礎。

事實上，由於來自各國不同的社會情境與敘事考量，該書多位作者所提供的多角度、多元化觀點，足以促發各個學科領域的新眼界。一方面，他們分析各種論述的差異政治，直接進入傅柯的「性治理」，另一方面也強調，做為界線與差異，性如何造就了公民內部的不平等。能夠以此種廣闊的視野揭露行政管理中的性／別差異，此書作者們靠的是積極轉換他們的研究方法與發言位置，將文化詮釋注入公共論述的權力分析。他們把問題焦點轉向文化成因與詮釋，謹慎聚焦於在地環境與性意義的文化分析，試圖將研究對象由「界外人」（outsider）轉化為「局內人」（insider），越過科學的距離貼近他們的文化處境，以理解並詮釋他們的生活現實。藉此，他們由行政管理措施解讀道德壓迫與性價值優劣，如何以「性」對「人」進行區隔與污名化。

而愛滋防治計畫中的保險套，也被視為國家的治理技術之一，它一方面執行公共行政的古老任務，安排生命的照養，另一方面，也透過身體的隔離，形式化無生

⁶ 引自 Kareen Ror Malone, 'Keeping Subjectivity in Sexuality: the Good, Bad and Excessive', *Theory & Psychology*, 12(3): 411-421。

殖的性。他們所強調的是，行政管理中的性，既仲介也組織了身體 / 生殖 / 生命的關係，同時，它定義了性主體的可能性（defining the possibilities open to sexual subject）。但身體 / 慾望也因此成為顛覆治理權力的場域。藉著聚焦於色情的身體及他們的性實踐，也藉著探討同性戀的理性，蓋瑞·道希特（Gary W. Dowsett）強而有力地站在自身所處的環境及個人經驗，提出一種由慾望所驅動的、更複雜的社會性，將性置於創造社會性的核心，營造社會空間、認同與主體性、集體慾望與性文化的眾多可能。

雖然此書各章節探討的方向及理論層次範圍廣泛，他們卻同樣關切全球「性」的快速變貌，以及為了性權、健康與幸福（well-being）的抗爭，作者們試圖改變當前的性 / 別概念，將這些概念連結至權力、抗爭與解放。同時，這些議題也涉及晚近所提出的、社會內部的不平等關係。他們直接呼應傅柯的性部署觀點，指出性的治理技術往往奠基於一套階級化的身體 / 性道德價值：

生活政治秩序的形成，並非透過奴役他人，而是經由自我的肯定。對十八世紀取得霸權的那個階級而言，一發現性不只是為了再生產（政治經濟學），也不必用外科手術把性從身體切除（醫療），而視為無用的、昂貴的或危險的，反而認為有必要照料、保護、鍛鍊自己的身體，遠離危險及接觸，與他人隔離，以保有自身特定價值；配備一套性的技術。（Foucault, 1990: 123）

傅柯認為，十八世紀以來，資產階級對性產生了新的認知，他們經由對自己身體的肯定，發展出一套照養的價值與方法，進而演變為自成一格的生活秩序。然而，隨著時間的推進，這套性的技術逐漸由資產階級的自我管理原則，變成自我標榜的價值體系，甚至成為與其他階級相互區隔的方式，營造出階級霸權的壓制效應。到了十九世紀末，由於整個社會已養成了一個「性的身體」，以及新的區分方式，資產階級重新確立自己性的特殊之處，畫下一道分界線以自我保護。當階級衝突轉化為監督無產者身體和性時，一系列行政與技術措施平和地將性機制植入了被剝削階級。（Foucault, 1990: 126-128）因此，傅柯認為，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議題就是性的管理，性化身體的各種規則，在其間競逐並生產權力，而階級是最重要的一條界線，它將特定的性 / 別規範導入行政措施，並成為政府施政的理念。

依照傅柯的觀點，性與身體的關係是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，同時也與特定階級的價值觀相結合。延續此由「性治理」的觀點，此書也指出，愛滋預防計畫常被

包裝成生活風格的改變，一個道德生活的世俗版本。各種華而不實的活動，運用禁欲與使用保險套等（因缺乏社會情境而過度簡化的）詞彙，被用來行銷這種道德生活。例如，性工作者被認定為有能力與顧客溝通使用保險套者，如果她沒做，總是有監督機制—檢驗—以確保一個「較乾淨」的社會。因此，決定行政管理方式與對象的，並非公平、客觀的知識或法律，而是因為性價值的區隔所界定的下層階級，被要求服從特定道德標準與權力秩序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行政管理中性主體的差異，其實是來自階級的性價值差異，其政治效應則顯現為行政措施的排定與施行。

二、愛滋防治與道德恐慌

為何愛滋難以正面的方式被理解？性差異如何生產愛滋的想像與權力技術？麥克·唐（Michael, L. Tan）以菲律賓的愛滋防治措施為例，說明建立在道德恐慌上的政策管制，如何強化了性與階級的權力關係。他認為，以總人口為對象的疾病防治及階級壓制，其實是來自不同階級的性差異。由於愛滋所負載的性污名，常使大眾陷入恐慌與焦慮，以致於傾向以性的價值防線，區隔愛滋檢驗所設定的「我者」與「他者」。他者又常被指稱為性不潔者，例如，女性的性工作者就被認定是預防愛滋最沈重的負擔。他指出，典型的都會迷思是：據說女性的性工作者與男同性戀者感染了愛滋，然後，他們不見了，隨即，大眾對他們散播疾病的恐懼開始顯現，檢舉這些逃亡者，甚至「為他們自己好」，再做一次檢驗。檢驗被視為讓社會大眾相信，政府採取行動對抗愛滋。然而，對象卻是那些被認定為「高風險」的他者。換句話說，行政措施以「健康、衛生、延續後代的身體」，為大眾建立普遍性的正統規範，但必須被檢視、受規訓的卻是那些不合格的邊緣人口。因此，藉著愛滋防治計畫的推行，性差異的界線再度強化了階級差異與壓迫。

在這篇文章中，唐質疑，現代人口管理的正當性基礎，其實是建立在性與階級所勾連營造的道德恐慌之上，再藉著社會大眾的情緒變化，創造科學、知識與道德的客觀中立，監督並檢查公民生活。因此，他探討愛滋如何為社會所建構，其論述所創造的道德柵欄又如何從醫療汲取權力與合法性。更明確地說，他的分析重點在於，性的道德價值如何被轉化為對特定人口的科學真理與管理措施。事實上，人們對未知的恐懼使大部分的愛滋防治都混合了宗教與醫療，而道德恐慌也很容易就轉換成醫療專業名詞，從而又深化了邊緣性主體的污名。所以，即使愛滋基本上不過是一種性傳染病，但人們卻相信，它最初的病症顯現於擁有數名不同性伴侶的肛交

者。這無疑是藉著道德的科學化，讓道德恐慌穿戴成一種醫療監督模式，使醫療病理學變成社會病理化的基礎。然而，當道德恐慌自然轉變為科學真理與行政技術時，「安全／危險的社會／心理範疇」也暴露出權力的運作與限制——誰的安全標準凸顯出危險的「重大」呢？

而類似的科學真理模式，也常再度強化階級差異以及異性戀／同性戀的對立關係。大多時候，愛滋的文化形象持續強化階級歧視與偏見，一方是乾淨而健康的富人，另一方則是污穢且染病的窮人，現在又與雜交的形象重疊。此外，資產階級還透過論述強化統治權力：針對社會的中高階層所發行的媒體，往往反映出公共政策的取向。最後，「正確」的知識幾乎無時無刻不進行司法般的審查過程：愛滋病是異性戀的正常夫妻用來描繪性工作者與同性戀的「知識」；不談愛滋危險的知識是「無知的」：不只性是危險的，有關性的知識都是危險的——如果它疏忽愛滋嚴重後果的話。

這種主體的污名化策略在道德／醫療／知識的相互運作，反而使愛滋帶原者得以扮演一個戲劇性的角色。在菲律賓，政府部門也雇用愛滋帶原者擔任輔導工作，表面上，這是個很進步的政策，可以提供生計給那些帶原者，並營造出人道關懷的氣息。然而，這樣的計畫卻隱藏著更深刻的污名化效應。因為，不可避免地，這些帶原的輔導者總會談到他們如何因「惡劣行為」而得病。事實上，帶原者在媒體道德中扮演著強化刻板印象的角色，報紙文章總是在結尾放上這麼一段：他們現在都奉行安全的性，提倡禁慾，對伴侶忠實，正確而持續地使用保險套，以免散播疾病。在這種「犯錯者的真情告白」中，情緒的感染反而使性的政治正確更加危險，持續性污名的再造與標籤化。

藉著愛滋防治計畫的探討，唐所企圖揭露的是，行政管理中的性如何創造出不平等。他強調，這些性邊緣主體的產生，是因為愛滋以創造「他者」的方式，打開了社會邊界設定的意義——將那些令人憎惡又恐怖的東西擬人化。表面上，愛滋預防採取的是「社會保健」模式，事實上，這個詞彙卻是官方醫院檢驗性工作者是否感染時用的。這個新的醫療——道德詮釋，原本來自特定的保守團體，但經由官方與私人的預防活動，世俗的政治正確高調不斷被強化，而由於未能認知到它監督、控制、污名化的次文本，新的霸權反而更危險。因為，建立在性道德上的新霸權不但將性再度污名化，也在公共衛生與性教育的推展過程中，將這套新標準深化為個人的自我判准，生產出新的性／別規範。

三、保險套與性工作

社會生存的困境，是性治理的階級壓迫造成的嗎？在研究非洲城市的性工作意涵時，幾位作者指出，將愛滋與性工作扣連在一起，凸顯了社會對她們的共同想像—多重的性，危險的性，付錢買性—這些都可能威脅到社會生活，擾亂正常的「性」，特別是那些已經被典範化、廣被接受的價值圖像，包括異性戀、忠實、婚姻、健康、生存方式等。這個性價值的對比，使得性工作者被規類為「不正常的人」，也因此被認為是「必須使用保險套才不致染性病者」。這意味著，原本已經存在的性價值差異，經由行政措施的介入，變得更加深刻了嗎？

文中首先說明，在非洲的許多城市，性工作是一種對抗貧窮的生存之道。他們提出一個重要概念：生存的性（survival sex），將性工作歸類為小規模、非正式部門行業的賺錢方式之一，如同販售家庭手工縫製衣服，兜售自己種的蔬菜水果，私自釀酒出售，開設非法酒吧，偷竊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型犯罪。換句話說，以當地的社會情境而言，性工作是現代個人努力營生的方式之一，也是早已存在的一種交易模式。受訪的性工作者就說：這真的只是一種工作。也有人解釋：這就是我們可以活下來的方法。

作者們特別指出，在 25 年前的在地生活紀錄中，下面這段話吐露了時代的精神：「警察碰巧知道我們釀私酒為生，一定會捉我們，__我們必須繳付罰款，然後重新開始，然後他們又來__我們還能怎麼辦？__我們必須捉住機會。__我們女人沒有其他工作，而男人賺得又太少，無法養活孩子」。⁷這顯示，貧窮與風險之間不間斷的結構關係是明確的，唯一改變的是，愛滋使得女人所捉住的機會不只是生存，也是死亡。因此對許多當地的性工作者而言，社會生存只能以長期暴露於疾病與死亡的風險達成。但即使如此，保險套的使用，對不同環境的性工作者，仍然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。

作者們在南非著名的德爾本（Durban）商港—也是國際觀光勝地—分別找了三個地點：位於市中心港口區的中心點（Point），距離港口約 6 公里，仍可算是市區的工業地帶（Industria），以及市郊的住宅區（Suburbia），觀察當地性工作者

⁷ 詳見 E. Preston-Whyte, C. Varga, H. Oosthuizen, R. Roberts, and F. Blose (2000). Survival sex and HIV/AIDS in an African city. In Parker, Richard, Regina Maria Barbosa, and Peter Aggleton (Ed.),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 (pp. 165-190.),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p. 185.

對使用保險套的看法，他們發現，由於性工作者自身專業化程度與社會定位有所不同，保險套的社會意義在這些地區差異很大。在中心點地區，即使存在明顯的（黑／白）種族界線，但性工作者們都以自在開放的態度稱呼彼此為妓女，「不戴保險套的客人就不接」是大多數人的原則，但與私人伴侶在一起時就不用，顯示出公私分明的生活態度。但是，在工業地帶的性工作者就不太一樣了，他們的工作地點是危險性和犯罪率較高的，大多不把這當成自己的主要職業，由於當地有很多卡車休息站，來來往的卡車司機在停留期間，常與特定的性工作者保持長期性關係，因此很容易將交易轉化為私人關係，以致於這些司機拒絕在交易後付錢，改以每個月定期付款包養或送小禮物。相對地，性工作者也因此無法要求顧客戴保險套，得愛滋與否，他們只能以宿命論的方式來面對。

距離德爾本城 15 公里的市郊住宅區，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所興建的城鎮，當地居民清一色是非洲人，以勞動階級為主。這裡的女人否認自己是妓女，她們自己和她們所接觸的男人都不這麼認為。但是，很少女人跟她們的男人保持長期關係，好像很容易一個換過一個。大部分在 Suburban 的女人不喜歡保險套，她們說，一旦被發現擁有保險套，她們就會被貼上「染病妓女」的標籤。她們還說，她們不能設定性行為的條件，否則就被認定為妓女。這些概念很普遍，導致「保險套的使用是骯髒的、染愛滋的」變成一種持續的社會建構。當愛滋病毒的認知開始散播並公開化，這種信念與恐懼也隨之增長、具體而明確化。在此，性所喻示的是生存的問題，但愛滋卻強化了生存的困境與抉擇，從彰顯了性工作對個人生命的支持效應，與保險套所投射的「不潔的性」。

做為一種預防愛滋的行政措施，保險套被認為是好的、有益的、可以防止性病傳染的。然而，由於社會中既存的性差異將性工作者設定為「高風險族群」，使得性與性工作的多重意義，往往也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被忽略了。幾位作者們藉著不同地區性工作者對自身勞動與保險套的看法，努力強調，權力技術中**主體的形成與與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密不可分，而且常是多重的、相對的**。生存的性因此具體而微地挑戰了公共行政的管制基礎：如果性差異是內在的價值判准，那麼治理的技術是否也是一種決定「主體能否生存」的方式？當生命價值的問題浮現時，作者們的觀察是，行政管理的性價值階序必須改變。他們認為，在許多介入愛滋的文獻中，有很多是需要賦予人們力量的，特別是，使女人掌控她們自己的生活與性抉擇。該書作者們因此主張，假如性是一種生存策略，如同教育一般，賦予人們經濟及個人能力，那麼長期而言，公共政策也應當以此為取向。

結 論

行政權的管制基礎是什麼？由各國政府的愛滋預防措施入手，此書作者們所探討的是，現代治理如何以對抗疾病之名，將性機制植入人體，並順勢對總人口分類定型。但藉由各個不同文化場域的在地詮釋，他們重現了當代性主體的多重差異，同時，透過知識／權力／主體的分析，檢驗政治理性與管理技術的連結，並指出那些在行政執行過程所設定的邊緣性主體，其實正是現代國家治理技術形成的關鍵。當道德恐慌與性禁忌塑造出看似合理的醫療論述時，國家行政機構就可以「必須保衛社會」之名，維護特定的權力秩序，指定特定群體為「高風險者」，從而再造性規範，並使性差異成為行政管制的基礎。

因此，公共行政便成為道德價值鬥爭的場域，自身也構成一股重要力量，匯入社會的再生產。以性治理的觀點而言，性被理解為文化的一部份，經過社會化而形成，組織出一個霸權式的社會／文化結構，監督身體的可能性。然而，要使特定的性價值成為規範，性的文化意義就必須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再造，而當性的下層階級一如性工作者一因其生存之道而遭受文化壓迫時，內在於行政措施中正確／錯誤的二元對立關係，反而暴露出文化霸權的政治操作。這顯示，公共行政既是生產性／別規範的障地，也是顛覆規範的處所，而邊緣性主體則是其中的抗爭點。

換句話說，權力技術所蘊含的政治理性與主體性是彼此對應的，但邊緣主體的能動性，反而造就了質疑權力與對反論述產生的關鍵。羅斯琳德·派翠斯基（Roselind P. Patchesky）即指出，在九〇年代的國際會議中，許多參與者都藉著反性騷擾、反性暴力的論述，將性注入人權議題。對此，她的質疑是：為什麼用負面的方式強調性自由，比用正面的、解放的意義來得容易？為何，為女人的性權聚集共識，靠的不是盡情享受身體的權利，而是不帶偏差、不被剝削、不被強暴、販賣、侵害身體等負面說法？這種否定性、否定主體能動的說法，企圖隱藏的是性的正面力量，她們利用女人「受害者」的形象，強化「健康」與「人權」議題的正當性，從而導致「身體」與「性權」無法在論述中浮現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此書作者們所努力嘗試的，是回溯政治理性中去性、去主體化的運作，重新挖掘邊緣主體的能動，以他們自身的觀點，創造出顛覆權力關係的對反論述。

就此意義而言，這本書探討愛滋防治計畫，正是為了嘗試由邊緣性主體的角度，探詢「生活秩序」中性的差異與爭議。公共行政因此被解讀為一套文化管理規

則，透過性差異的挪用與強化，再現各式各樣的性異議份子。在當代社會，性的被管制來自於「文化民主化」的威脅。尤其在一個越來越個人化、原子化（孤立自我）的社會中，民主化的文化生產（與消費、流通）有著創造新的社會團結（solidarity）與形成各類社群的功能。然而，邊緣性主體表達或分享的「自我」可能挑戰了既定的社會秩序，因而受到檢查查禁與後來的懲罰（社會污名或司法刑責）；面對新的文化民主化局面，除了各種法律與檢查制度外，公共行政能否提出更開闊、更具創造性的視野？

做為一種權力技術，行政管制面對的是，承載了各式性異議的主體，二者之間力量關係的改變，往往牽動著現代主體性的置換，以致於治理的問題必然浮現。在論證何謂治理時，傅柯曾言，我們活在十八世紀出現的治理時代。國家的治理基本上就是一個矛盾的現象。既然治理的問題與治理的技術已經變成唯一的政治議題，政治鬥爭與抗爭的唯一實質空間，正是因為國家的治理化，同時也允許國家得以持續存在，正是治理的技藝，使得什麼是國家的權限，什麼不是，什麼是公，什麼是私等等，可以不斷被定義與再定義。也因此，基於治理的整體戰略，國家的存在與限制可以被理解。（Foucault, 1991: 103）對傅柯而言，國家並非一成不變的建制，行政管理技術能夠管什麼，能夠製造出什麼樣的性範疇與性主體，用什麼方式理解性並定義國家，在在都涉及治理如何產生並實踐。或許，這本書也藉著邊緣性主體的塑造，偶然地也部份地回應了這個「國家是什麼」的問題。

參考文獻

- 趙曉力、王宇潔 譯（2002）。政治與理性。（Foucault, Michel 原著）。2005年2月8日，取自
<http://intermargins.net/intermargins/TCulturalWorkshop/academia/scholar%20and%20specialist/fucault/f06.htm>。
- 夏林清（編）（2000）。**日日春—九個公娼的生涯故事**。台北：台灣工運雜誌社。
- 許雅斐（2007）。性／別規範與仇恨犯罪：性工作的政策管制。**文化研究**，第4期，頁39-80。
- 甯應斌（2007年3月）。認真看待色情。發表於第七屆『性／別政治』超薄型國際研討會，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，桃園。
- Butler, J. (1997). *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*. Stanford, California: Stanford UP.

- Dowsett, G. W. (2000). Bodyplay: Corporeality in a Discursive Silence. In Parker, Richard, Regina Maria Barbosa, and Peter Aggleton (Ed.),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 (pp. 29-45),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Foucault, M. (1990). *The history of sexuality, volume I: introduction*, (Robert Hurley (trans.) New York: Vintage Books.
- Foucault, M. (1991). **Governmentality**. In Burchell, Graham,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(Ed.) *The Foucault Effect: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* (pp. 87-104).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Foucault, M. (1995). *Discipline & punish: the birth of the prison*. Alan Sheridan (trans.) New York: Vintage Books.
- Greenhalgh, S. (2001) Book Review on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. *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*, 27(2): 386-387.
- Malone, K. R. (2002). Keeping Subjectivity in Sexuality: the Good, Bad and Excessive. *Theory & Psychology*, 12(3): 411-421.
- Parker, R., Barbosa, R. M. & Aggleton, P. (2000). (eds.).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.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Patchesky, R. (2000). Sexual Rights: Inventing a Concept, Mapping an International Practice. In Parker, Richard, Regina Maria Barbosa, and Peter Aggleton (Ed.),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 (pp. 81-103),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Preston-Whyte, E., Varga, C., Oosthuizen, H., Roberts, R., & Blose, F. (2000). Survival sex and HIV/AIDS in an African city. In Parker, Richard, Regina Maria Barbosa, and Peter Aggleton (Ed.),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 (pp. 165-190),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Tan, M. (2000). AIDs, Medicine, and Moral Panic in the Philippines. In Parker, Richard, Regina Maria Barbosa, and Peter Aggleton (Ed.), *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: the Politics of Gender, Sexuality and Power* (pp. 143-164), Berk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
